

## 施蛰存与郭沫若的“文人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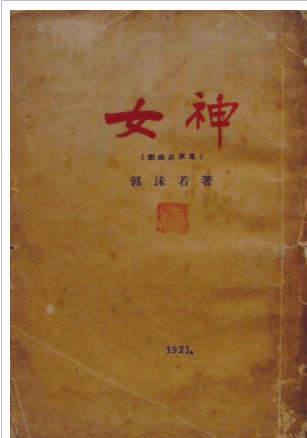
■官立

《施蛰存全集》第五卷《北山散文集》第四辑是日记、书信卷，其中收录了施蛰存给顾国华的书信两通。而顾国华自印的《文坛杂忆信札选》，选录了周振甫、王世襄、萧乾、杨绛等名家给他的书信共计175通，其中有施蛰存2001年6月10日给他的书信一通，摘录如下：

郭沫若办创造社时，是我很崇拜的新文学家，他的《女神》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很有功劳……1937年，郭沫若自日本回国，是我和郁达夫、陶亢德一起雇汽车到轮船码头上去接他的……

施蛰存的这封信不见于《施蛰存全集》。而施蛰存与郭沫若分属于不同的社团流派，他们的交集并不多。笔者结合相关资料，对这封信略作钩沉。

施蛰存在1933年5月所写的《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中自述了他三读《女神》时的不同感受：“在文艺写作的企图上，我的最初期所致力的是诗”，“我从他（笔者注：胡适）的‘诗的解放’这主张里，觉得好像应该有一种新的形式崛起起来，可是我不知道该是哪一种形式”，“这个疑问是郭沫若的《女神》来给我解答的。《女神》出版的时候，我方在病榻上。在广告登出的第一天，我就写信到泰东书局去函购。焦灼地等了一个多礼拜才寄到。我倚着枕读《女神》第一遍。那时的印象是以为这些作品精神上是诗，而形式上绝不是诗。但是，渐渐



郭沫若的《女神》



顾国华自印的《文坛杂忆信札选》

地，在第三遍读《女神》的时候，我才承认新诗的发展是应当从《女神》出发的”。

施蛰存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提到，“郭沫若的《女神》是我买的第一部新诗集。《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我买的第一部新文学出版物的外国小说。在早期的新文学运动中，创造社给我的影响，大于文学研究会”。施蛰存不单阅读过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还阅读过郭沫若翻译的其他作品，他在《尼采之“中国舞”》中回忆，“第一次将尼采介绍给我的，是二十年前的民铎杂志尼采专号；第二次是郭沫若先生译的‘查拉图斯屈如是说’，即是登在创造周报上的。我读郭氏的译文，觉得不容易懂。但这不是不信任他的译文，也不是说郭氏译笔不好，而是仿佛觉得尼采这种文体没法子译成毫不走样的中文。

尽管郭氏的译文，是如何忠实，是如何竭力求达，还好像毕竟与原文隔着一重纱似的”，后来对照其他译本，才发现“郭沫若的译文原来已经是够好的了，可惜他没有把全书都译出来”。经查阅，《创造周报》自创刊号至第三十九号连载了尼采著、郭沫若译的《查拉图斯屈如是说》第一部。

施蛰存在信中谈论的另一话题是“郭沫若归国谁相迎”。郭沫若1937年7月27日下午从日本回国抵达上海。林甘泉、蔡震主编的《郭沫若年谱长编》提到，下船后，“郭沫若与金祖同同往中法交流委员会孔德图书馆沈尹默处”，“专程从福建赶来的郁达夫，以及得知消息的李初梨、张凤举、施蛰存、陶亢德、姚潜修先后来到孔德图书馆。随后，同往喜来饭店”。关于施蛰存的回忆，陈子善认为“施没记错，

但没讲全。当日，郁达夫、陶亢德和施都去码头接，施和陶一起去，郁单独去，在码头见到。但都未接到。然后三人一并于孔德图书馆，才见到郭。晚郁为郭接风。施陶先告退了。所以施的回忆不错，但不全”，“施陶接郭，也有原因，郭是施编《现代》和陶编几个杂志的大作者”。关于“郭沫若归国谁相迎”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廖久明在《“郭沫若归国谁相迎”杂考》（《郭沫若研究》2018年第一辑）中作过细致的辨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看。

此外，关于施蛰存与郭沫若，还有一事不能不提。1924年3月28日《创造周报》第四十六号刊有郭沫若1924年3月20日给施蛰存的一封信：“施蛰存先生：小说稿已奉读，请把住址示我。”笔者注意到施蛰存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中回忆：“当我住在哈同路民厚里的时候，我打听到了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诸先生也都住在同一里内。我就将我所写的两篇小说封了亲自去投入他们的信箱中。这两篇之中，有一篇的题目是《残花》，我还记得。过了几天，《创造周报》上刊出郭沫若先生给我的一个启事，问我的通信处。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去告诉他我就住在与他们同一里内，并且还问他我的小说是否可用，因为我很担心他问了我的通信处是预备退稿的，三日后，接到他的信，要我去一谈。可是我忐忑着

没有敢就去，延迟了一个多星期。等到在一个晚上去时，他已到日本去了。只见到了成仿吾先生，他说郭先生把我的小说稿也带着走了。这样，再过了七八个星期，《创造周报》停刊了，我的小说稿又遭到了不幸的命运。”施蛰存在《浮生杂咏》第四十一首的“自注”也有提到：“创造社同居民厚南里，与我所居仅隔三四小巷。其门上有一信箱，望舒尝以诗投之，不得反应。我作一小说，题名《残花》，亦投入信箱。越二周，《创造周报》刊出郭沫若一小札，称《残花》已阅，嘱我去面谈。我逡巡数日，始去叩门请谒，应门者为一少年，言郭先生已去日本。我废然而返。次日晚，忽有客来访，自通姓名，成仿吾也。大惊喜，遂共座谈。仿吾言，沫若以为《残花》有未贯通处，须改润，可在《创造周报》发表。且俟其日本归来，再邀商榷。时我与望舒、秋原同住，壁上有古琴一张，秋原物也。仿吾见之，问谁能弹古琴。秋原应之，即下琴为奏一操。仿吾颌首而去。我见成仿吾，生平惟此一次。《创造周报》旋即停刊，《残花》亦终未发表。”由此可知，施蛰存曾向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轮流编辑的《创造周报》投过稿，施蛰存访郭沫若而不遇（郭沫若1924年4月1日离开上海奔赴日本福冈）。郭沫若信中的“小说稿”，施蛰存的两次回忆略有不同，一说是两篇小说，其中一篇是《残花》，一说是仅《残花》一篇。可惜的是，《残花》未能刊出，我们无从知道这篇小说的具体内容，施蛰存先生2003年就离开了我们，我们也无从就这一问题向他老人家请教了。

（上接第一版）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命他组建国际问题研究所，该所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等重大情报均作了准确的预测与及时传递。王芑生还是日支人民战线谍报组织中方的领导者，殷尘（金祖同）在《郭沫若归国秘记》一书中写道：“他（钱瘦铁）告诉我他在（1937年）五月里回国的时候，在南京遇见了王某某（王芑生），知道这时国内国共合作的声浪已渐渐地高了，王某某在最高当局面前提起过鼎堂（郭沫若）先生。”由此可见，郁达夫信中所提的“因接南京来电”，应该是王芑生。而郁达夫1936年11月赴日时所频繁接触的日本反战左翼作家如田中中夫、佐野袈裟美、冈部信次等，都系日支人民战线的负责人及骨干。惟其如此，一个从未被披露或是揭晓的历史悬案浮出了水面，即作为著名作家的郁达夫，在民族存亡的严峻时刻，英勇地参加了抗日谍战工作。为此，日本军国主义者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将他在1936年11月提前驱逐回中国。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警视厅的情报收集及侦察能力也是很厉害的，据战后揭秘的日本警视厅档案记载：1928年2月25日，郭沫若为躲避国民党通缉，在相当保密的情况下悄然在上海汇山码头登船离开上海赴日本。几乎同时，日本在上海的密探就将郭沫若赴日的情报发给了日本警视厅，即新揭秘的日本警保局编《外事警察概况·昭和12年篇》中的《上内警发秘第七十四号雪停事务官通报》。由此可知，日本警视厅对郁达夫参加反战的谍报工作情况是相当清楚并对此立案的。

## 郁达夫之死的真正原因

郭沫若归国后，即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郭即邀请郁达夫参加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任政治部设计委员，郁达夫同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及《抗战文艺》编委。郁达夫还曾作为特使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代表团到台儿庄劳军。1938年，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赴新加坡担任该报主笔，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他还组织“星洲华侨义勇军”抗日，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后，1942年6月，郁达夫和胡愈之等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亚公务市，郁达夫化名赵廉开了一家酒厂作掩护。日本宪兵发现这个“赵廉”能讲能写日语，遂胁迫他当了七个月的翻译。郁达夫在此期间救助、掩护了大量文化界抗日人士及当地居民。由于汉奸告密，日本宪兵开始注意并调查郁达夫的真实身份，郁达夫不得不转移流亡到苏门答腊岛西部的小镇巴爷公务，1945年8月29日晚被人带走，9月17日被秘密杀害于当地丛林。

郁达夫之死作为一个历史悬案，历来说法颇多，但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写的专著《苏门答腊的郁达夫》。早在1966年他就开始了对郁达夫流亡南洋生活的研究，他曾到印尼苏门答腊等地作了实地调查，后终于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

他承认是他下达了命令杀害郁达夫。这个宪兵班长所说的下达命令，应当是转达命令。他一个小小的宪兵班长，是不能操生杀大权的，无疑是他上司下达的命令他转达一下而已。至于为什么在战败投降后，日本法西斯分子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杀害这样一位中国著名的大作家，铃木正夫并没有在书中回答。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日本战后部分军方、警方绝密文件与档案当时尚未揭秘，因此，也无法解开郁达夫之死的真正原因。

前面说过，实际上早在1937年8月，郁达夫就上了日本警视厅的“日支人民战线”黑名单，存有谍报档案。其后郁达夫在国内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到新加坡后，他又成了南洋文化界抗日的领袖人物，日本军方对其恨之入骨。新加坡沦陷后，他化名流亡到苏门答腊，由于汉奸告密，日本军方开始对他进行真实身份的调查，通过和日本国内警视厅的联系，日本军方掌握了郁达夫的相关情况。日本警视厅的情报收集是无孔不入的，据《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一期武继平（日）在《“日支人民战线”谍报网的破获与日本警务对郭沫若监视的史实》一文中披露：“郁达夫这样引人注目的人物当时两次私访须和田郭宅，金祖同1936年暂居市川时起就经常走访郭家，自然会引起警方的注意。金虽然没有言及在频频走访郭宅时曾碰见过便衣警察或有被跟踪监视的感觉，但他的名字写在警视厅所掌握的‘人民战线运动及谍报网’黑名单上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而郁达夫上黑名单

也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另据战后揭秘公开的日本东京法院1939年9月13日对钱瘦铁的三审判决书第四条裁定：“在日本亡命之中国共产主义者郭沫若，因支那事件爆发，国共提携，对之逮捕令已撤销，企图回国，而穷于旅费，被告（钱瘦铁）在日本与左翼分子多交游，归国后可推进中日人民战线运动，于同年7月22日在中国大使馆，与郭沫若弟子金祖同约会，以500元托金充郭之旅费，并设法予以方便，使郭得于同月25日潜行回国。”由于此份判决书是针对钱瘦铁的，因此没有提及郁达夫。但钱瘦铁与金祖同在中国大使馆秘密约会的情报都被日本警视厅所掌握，所以郁达夫参与郭沫若归国的谍报也在日本警视厅掌握之中。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早在1937年8月，郁达夫就上了日本警视厅《日支人民战线谍报图》黑名单的事实。郁达夫自1945年8月29日晚被带走至9月17日遭毒手，日本宪兵正是利用这20天的时间，通过调查，核实了郁达夫的身份。郁达夫不仅是位抗日谍战的高层人士，而且是文化艺术界抗日宣传活动的领袖人物，他还是中国著名的大作家，他在战后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指控将产生相当重大的社会影响。因此，日本法西斯分子在最后时刻垂死挣扎，令郁达夫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中倒下了。为此，著名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胡愈之曾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记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记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